

# 貴似晨星

余佩瑾

## 清宮傳世十二至十四世紀青瓷特展

繼一九八九年「宋官窯特展」之後，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推出的「貴似晨星—清宮傳世十二至十四世紀青瓷特展」，再度以南宋官窯為主題，展示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傳世器。這個展覽嘗試透過考古出土的新材料，重新檢視個別作品的造形、胎釉特徵及可能的產地。為了呈現宋朝青瓷的發展與演變脈絡，展覽中同時並陳與之密切相關的北宋汝窯、龍泉窯和元朝的青瓷碎器，希冀藉由實物的呈現，回應學界近年來關心的兩宋官窯議題，以及探究考古材料未能盡現的層面。

### 傳世意義

相較於世界上其他博物館寥若晨星的宋瓷收藏，本院及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清宮傳世青瓷，多數曾經經過乾隆皇帝識別和分類，展現出與眾不同、流傳有緒的面貌。特別是

透過有跡可尋的御製詩，可以追溯出包括乾隆皇帝在內的十八世紀研究者對於宋朝青瓷的理解，及汝窯、宋朝官窯、哥窯和章生二窯（龍泉窯）等不同窯口的分類，這些正是今日論述宋朝青瓷必然碰觸到的內涵；以今

觀古，亦能對比出不同時空脈絡下的解讀方式。由於乾隆皇帝歌詠陶瓷的御製詩約有二百首左右，以宋朝青瓷為題的作品占其中半數，在御筆下，上述窯口均被歸類成具有晨星般的品級，彌足珍貴。這也是本次展覽取名



北宋 汝窯 青瓷無紋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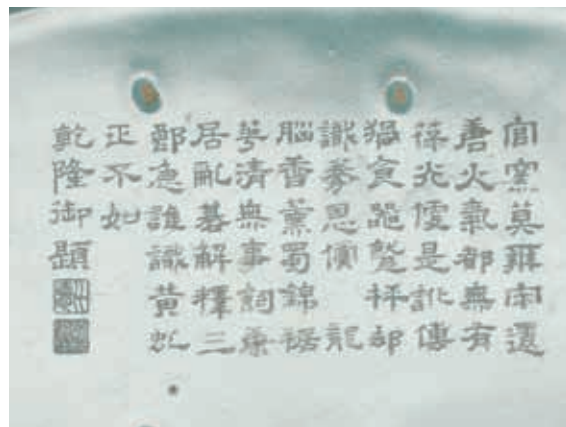




圖二 北宋 汝窯 青瓷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北宋 汝窯 青瓷無紋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緣由。(註一)

乾隆皇帝通過文獻取得的相關資訊，也如實地記錄在詩注中，從中可以一窺宋人葉實《坦齋筆衡》、明人高濂《遵生八牋》和陸琛的《春風堂隨筆》，均是深刻影響他對宋朝瓷窯判別的重要參考著作。

對兩宋瓷窯著墨較多的《坦齋筆衡》以為：「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麓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與之相近的宋人顧文薦《負暄雜錄》，也有如出一轍的紀錄：「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麓厚，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

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徽宗遺製，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兩份文本揭示的內容，無論是否如同學者研究指出般，互有傳抄的嫌疑。(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故宮學術季刊》二七卷四期)文中揭示汝窯、北宋官窯、修內司和郊壇下官窯，除了深具官方屬性外，彼此之間的發展關係，時至今日仍然是學者關注的焦點。

### 汝窯和北宋官窯

相對於南宋官窯，近年來學界對汝窯的關切，主要環繞著汝窯究竟是不是北宋官窯，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窯址出土和高麗青瓷相似的器形所反映出來的意義是甚麼？南宋人眼中堪稱是青瓷典範的汝窯，傳世有二十五件作品可以追溯到個別經過乾隆皇帝收藏的背景，展現出它們經過識別的經過和十八世紀人眼界下的胎、釉形貌(北京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辦的汝窯學術研討會上，陳愷俊曾出示一件費城藝術博物館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收藏的汝窯盤，底部亦刻有御製詩，但筆者認為該字體與清宮傳世者不同，故本文暫不列入計算。

近三十年來的考古發掘，在清涼寺窯址中發現許多和傳世器相似的標本，透露出該一窯址可能正是這批傳世汝窯的產地。(註二)尤其是，除了明清兩朝景德鎮仿燒器之外，目前僅見於清涼寺窯址的水仙盆，傳世共計六件，分別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和吉林省博物院。(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國際交流特別展「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故宮博物院編《汝窯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窯瓷器畫萃》)(註三)其中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無紋水仙盆〉(圖一)最受世人矚目。該件作品器底刻乾隆皇帝「獨食盆」御製詩，通過蔡鴻生的考證，得知獮子指哈巴狗。乾隆皇帝詩中「亂莽解釋三郎急」的典故出自《天寶遺事》。所謂「獮子亂局」，指受寵參養於宮中滿地行走的哈巴狗，甚至搗亂了唐玄宗的棋局。在另外兩首歌詠水仙盆的

詩中，也見他加註表明水仙盆的器型當時有「太真獨食盆」(一七六一：〈獨食盆〉詩)和「唐宮貓食盆」的說法(一七七三：〈詠官窯盆〉詩)，以至於讓他在詩中盡數唐宮飼養哈巴狗的軼事。至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有機會重新檢視早年題寫的詩句，不由得有感而生「謂獨食盆誠瀾語」(一七七九：〈題官窯盆〉詩)，一種想要修正過往言論的想法。

文獻中的北宋官窯究竟指什麼？如果將御製詩也納入研究史中加以考量，透過乾隆皇帝降旨將〈詠官窯盤子〉詩鐫刻到一件汝窯青瓷盤(圖二)的底部，從詩中所言：「祇以光芒煥定州，官窯秘器作珍留」，得知乾隆皇帝將該件作品看成是官窯。特別是在詩注中說明此份官窯觀的形成，乃是參考了《老學庵筆記》和《留青日札》兩部著作。由於兩書主要論述汝窯，因此乾隆皇帝以官窯的角度歌頌汝窯，明顯地表現出他把汝窯當作北宋官窯。

汝窯究竟是不是北宋官窯？謝明



圖五a 北宋 汝窯 青瓷弦紋尊 大英博物館藏



圖五b 南宋 官窯 青瓷弦紋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c 南宋 青瓷弦紋尊 老虎洞窯窯址出土



圖六a 北宋 汝窯 青瓷三足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b 北宋 青瓷三足洗 寶豐清涼寺窯址出土



圖六c 南宋 青瓷三足洗 郊壇下官窯窯址出土

物，而認為老虎洞窯開窯生產的時間

限。相對地，視老虎洞窯為修內司窯的學者，有鑒於窯址出土的仿銅器物，而認為老虎洞窯開窯生產的時間

所言之：「惟供御減退，方許出賣」，顯示出成熟階段的汝窯已為官方所壟斷，具備官窯的性質。對他來講，窯址發現的宋哲宗和宋徽宗時期的銅錢，顯示出官方掌控汝窯的時間應為徽宗宣政時期，此一時間點，因和前述葉實書中描述京師設置官窯的時間互為重疊，遂讓他以為即使如同文獻所言，北宋時期曾經存在一個京師官窯，其樣貌當離汝窯不遠。同樣相信汝窯具有官窯屬性的李喜寬，反思葉實「定窯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的意涵，除了據以論述「有芒不堪用」是促使汝窯出現的契機外，亦重申汝窯和北宋官窯同時並存直至北宋滅亡的可能性。

以實際出土物而言，無論老虎洞和郊壇下兩個窯址均出土十二世紀中晚期至十三世紀早期的青瓷作品，呈現出彼此的燒瓷時間互為重疊。最重要的是兩個窯址均出土和傳世汝窯器及清涼寺窯址所見標本雷同的作品（註八），如老虎洞窯出土的梅瓶、圓洗、紙槌瓶和弦紋尊（圖五）；郊壇下窯址出土的三足洗（圖六）、鴨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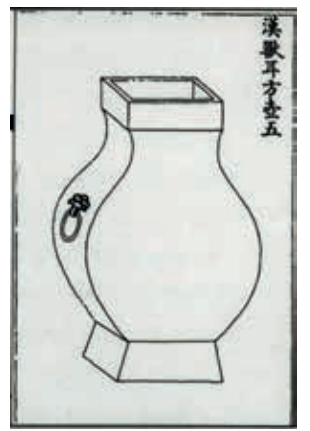
良從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兩地收藏的北宋青瓷以汝窯為主，而認為無論傳世的南宋官窯器或老虎洞、郊壇下兩個窯址出土的標本，均出現仿燒汝窯的例證，間接印證葉實對於南宋官窯設置背景有「襲故京遺製」的記載。另一方面，他也提出清涼寺窯址出土和高麗青瓷相似的器形，具體地回應宋徽宗頒布《政和五禮新儀》給高麗王朝的史實。其中適

同樣參照清涼寺窯址進行研究的王光堯，對於窯址就地掩埋廢次品的處理方式感到疑惑，他認為該一現象因無法呈現宋人周輝《清波雜誌》

和宮廷禮器局燒造陶器祭器有關，將開窯時間看成是和禮器局成立的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相當。後來因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有罷禮器局之舉，而且老虎洞窯址出土的標本，存在紹興十九年以後的類型，明顯地反映出不可能結束於紹興十九年，加上影響修內司開窯關鍵的邵局至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已經結束，遂又出現修內司官窯當介於紹興十九年至三十二年之間。那麼在這個範圍內又因為窯址出土的支燒墊餅，外底模印有「戊記」印銘，而讓唐俊杰以為「戊」字代表干支紀銘，修內司窯的燒瓷時間應是「甲戌」年，也就是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



圖三 宋 青瓷方壺 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窯窯址出土 與《宣和博古圖》漢代方壺



圖四 盥盆 浙江省杭州市老虎洞窯窯址出土

### 南宋官窯

文獻中南宋官窯的出現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雖然如此，從一九三〇年代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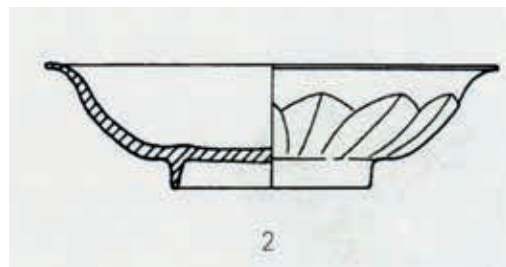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南宋 官窯 青瓷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a 南宋 官窯 青瓷蓮瓣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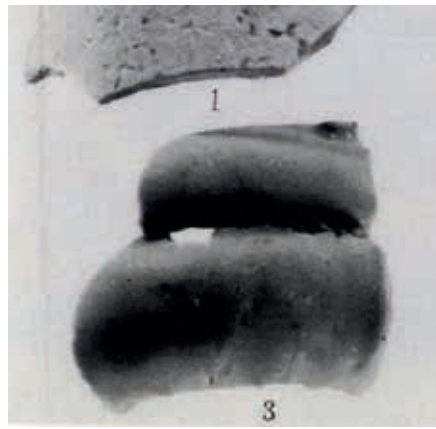


圖十二 南宋 官窯 青瓷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b 南宋 青瓷蓮瓣洗 老虎洞窯窯址出土 線繪圖

十二)的印花折枝花卉均是傳世難得一見的例證。同樣地，南宋官窯〈青瓷盤〉(圖十三)裝飾的劃花螭紋和南宋官窯青瓷盤、洗上(圖十四、十六)裝飾的模印龍紋，因龍紋象徵



圖十b 南宋 青瓷三登方壺殘件 郊壇下官窯窯址出土



圖十a 南宋~元 官窯 青瓷三登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a 南宋 官窯 青瓷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b 南宋 青瓷尊殘件 老虎洞窯窯址出土



圖七a 北宋 青瓷鴨薰殘件 寶豐清涼寺汝窯窯址出土



圖七b 南宋 青瓷鴨薰殘件 郊壇下官窯窯址出土

研究，所，《南宋官窯》。另外，近來備受矚目，出現在南宋官窯中的一類仿銅製品，固然可視為是承接北宋汝窯而來的發展系列，若考慮紹興年間因應復興北宋文化藝術而出現複製《宣和博古圖》圖錄和仿鑄其中的青銅器風潮(許雅惠，〈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三期)，而能反過來推想南宋官窯器中與之相關的簋式爐、貫耳壺，或可視為是同一脈絡下的產物。也就是透過仿燒北宋新成禮器一類的器型，輾轉傳達出重新建都完成的南宋朝廷追念北宋傳統的想法。因此，南宋人周密在《武林舊事》中所記，寵臣張俊於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向南宋高宗進獻十六件汝窯瓷器所訴說的情狀，自然也能理解成是藉由故國器用背後的歷史寓意，推崇杭州新政權具有秉承傳統的合理性。

就裝飾紋樣而言，南宋官窯器鮮少帶裝飾，南宋官窯〈青瓷花式洗〉盤面所見劃花折枝花卉(圖十一)，和南宋官窯〈青瓷蓮瓣洗〉(圖七)和帶模印蓮瓣紋的薰爐等皆為其中的例證，具體地反映出南宋朝廷「襲故京遺製」在南方重新設置官窯的背景。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為例，亦能從中發現與兩個官窯窯址出土物相似的例證，如南宋官窯〈青瓷尊〉(圖八)、〈青瓷弦紋尊〉、〈青瓷蓮瓣洗〉(圖九)等均可在老虎洞窯址中發現類似的標本。(同註六)而南宋官窯〈青瓷弦紋貫耳壺〉、〈青瓷三登方壺〉則近似於郊壇下窯址出土物。(圖十)(中國社會科學考古

研究，所，《南宋官窯》。另外，近來備受矚目，出現在南宋官窯中的一類仿銅製品，固然可視為是承接北宋汝窯而來的發展系列，若考慮紹興年間因應復興北宋文化藝術而出現複製《宣和博古圖》圖錄和仿鑄其中的青銅器風潮(許雅惠，〈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三期)，而能反過來推想南宋官窯器中與之相關的簋式爐、貫耳壺，或可視為是同一脈絡下的產物。也就是透過仿燒北宋新成禮器一類的器型，輾轉傳達出重新建都完成的南宋朝廷追念北宋傳統的想法。因此，南宋人周密在《武林舊事》中所記，寵臣張俊於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向南宋高宗進獻十六件汝窯瓷器所訴說的情狀，自然也能理解成是藉由故國器用背後的歷史寓意，推崇杭州新政權具有秉承傳統的合理性。

帝王而能連結宮廷用器的官方屬性外，參照北宋皇陵出土裝飾有龍紋與鳳紋的器用，也得以追溯出龍紋成爲帝王的象徵或始自於北宋。根據學者研究，宋人王洙《地理新書》（金明昌三年本）揭示的葬俗，反映出古代

堪輿術數中將百家姓和宮、商、角、徵、羽五音及土、金、木、水、火五行互相配屬、對應的觀念，由於北宋趙姓五行屬木相對應的五音是角，守護神爲龍，因此龍紋與配對產生的鳳紋遂成爲皇室的官樣圖案。（註九）

清涼寺和郊壇下窰址出土少數裝飾有龍紋的標本，除了展現兩宋官方用器互爲傳承的裝飾母題外，亦提供支持此一論點的具體物證。除此之外，南宋官窰菱花式洗、花口洗，龍泉窰長頸瓶、菱花式碗、梅花式碗等，因呈現出與墓葬或窖藏出土金屬器（圖十七、十八）互爲襲仿或共享的美感，而反映出一種跨越質材，流通於宋朝各個窰窰之間的時代風格。

不過最令人好奇，想要一探究竟的是，傳世器和窰址出土物無法互爲參照之處，例如青瓷菱花式碗、盤



圖十八a 南宋 龍泉窰 青瓷梅花式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a 南宋 官窰 青瓷菊花式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b 南宋 銀鑲金梅梢月紋蓋 中國福建邵武窰藏出土



圖十七b 南宋 菊花式銀盤 彭州窰藏出土



圖二十一 南宋 官窰 青瓷葵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南宋 官窰 青瓷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南宋 官窰 青瓷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南宋 官窰 青瓷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南宋 官窰 青瓷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南宋 官窰 青瓷葵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南宋 官窰 青瓷葵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a 元 青瓷葵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b 元 青瓷葵口盤 汪興祖墓出土



圖二三a 元 青瓷葵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三b 元 青瓷葵口盤 汪興祖墓出土

對一些現代學者而言，由於老虎洞窯址出土了和傳世哥窯器非常相近的產器，而讓他們認為該窯址即為傳世哥窯的產地。

回歸文獻，元人孔齊的《靜齋至正直記》中有：「乙未冬，在杭州時，市哥窑洞窯器者一香鼎，質細雖新，其色瑩潤如舊造，識者猶疑之，會荊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窑窯絕類古官窯，不可不細辨也」。若將文獻中提及的乙未年（一三五五）對照任仁發家族和汪興祖兩個墓葬所見文物，前者出土的魚耳爐、膽式瓶和貫耳壺等一系列開片青瓷因出自任明墓，故可將其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二）的卒年視為是出土品的下限。後者墓主汪興祖卒於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二），故該墓出土的青瓷盤則可看成是洪武四年以前的出產品。兩個墓葬相差二十年的分野，讓學者再引明人曹昭《格古要論》中：「舊哥窑出，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色好者類董窯，今亦少有。成群對者，是元末新燒，土脈粗糙，色亦不好」。而將任氏家族墓的

（圖十九）（圖二一）一類作品，不僅傳世不少，而且不乏具備南宋官窯器多層施釉及釉面帶鱗血冰裂紋的典型特徵，然而就出土報告所見，老虎洞和郊壇下兩個窯址雖也見到相似的器



圖二二b 元 粉青釉膽瓶 上海任氏墓出土



圖二二a 元 青瓷膽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形，但經仔細比較後，因樣式仍與傳世品略有差異，明顯地展現出不見於窯址，品質卻相對比較優越作品存在的現象，此點似乎呼應了學者研究以為另有尚未發現的南宋官窯存在的可能性。

### 青瓷碎器

瓷器釉表因膨脹係數的關係而產生的裂紋，稱為開片。施單青釉後，理所當然可以視為是青瓷碎器。具有開片特徵的作品，即文獻中提到以百圾紋見長的哥窯。哥窯的研究至少包

含兩個面向，一是文獻記載和考古出土材料的對照比較，另一個是流露於御製詩中的鑑賞觀。以往論述哥窯，最常援引《宣德彝器譜》的記載，將哥窯視為是宋朝五大名窯之一。但是回顧伯希和的考證，《宣德彝器譜》是十八世紀下半葉才出現的一部書，它和另一部《宣德彝器圖譜》內容相似，同樣在序文、編撰者上均出現與實情不符之處，明顯是一部偽書。既是偽書，書中所言自是不可信，在此之下，哥窯還是一個獨立的窯口嗎？



圖二二c 南宋~元 官窯 青瓷膽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九 南宋~元 青瓷蓮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八 南宋~元 龍泉窯 青瓷蓮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一 元 青瓷葵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十 元 青瓷葵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出土物看成是和官窯相似的舊哥窯，而汪興祖墓的出土品則視為元末新燒的類型。（王光堯，〈從考古新材料看章氏與哥窯〉，《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四年五期）

從中揭示了哥窯和南宋官窯產品相近，以及大量燒造的問題。關於前者，展出的元〈青瓷膽瓶〉（因器形和任氏墓出土品雷同（圖二二），間接透露出燒造於元朝的可能性，那麼對比另一件南宋至元官窯〈青瓷膽瓶〉，而能從中理解彼此的關聯。此



圖二五a 元 青瓷葵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六 南宋 官窯 青瓷葵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七 南宋 龍泉窯 青瓷葵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五b 元 青瓷葵口盤 汪興祖墓出土



圖三四 「永寶用之」銘青銅器 四川省遂寧窖藏出土

如果將「官窯」銘看成是元朝因追仿南宋官窯而藉由書寫方式傳達出官窯品牌的手法，另外兩件底部寫「寶用」兩字銘的〈青瓷花口盤〉（圖三三），或可視為是相同風潮下的作品。「寶用」銘款具有珍藏使用的含意，和青銅器上所見「子孫永寶用」相似，筆者認為這透露出模仿青銅器銘文的意圖。特別是如果再將四川省遂寧窖藏出土鑄刻有「永寶用之」四字銘的青銅器一起納入考量（圖三四），更可感受到追仿青銅製品與銘文、紋



圖三二 官窯銘殘件 老虎洞窯址出土



圖三三 元「寶用」銘青瓷花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點亦如同傳世帶開片特徵的葵口盤形器一樣，除了呈現與南宋官窯器的連結，和汪興祖墓相似作品居多的現象（圖二三～二五），也反映出元末大量燒造開片青瓷的可能性。其次，乾隆皇帝曾創作十九首詠哥窯御製詩。在他的視點下，哥窯如同明人陸琛《春風堂隨筆》的記載：「宋時處州章生一生二兄弟，皆主龍泉之琉田窯。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即官窯之類。生一所陶

淺白斷紋，號百圾碎，故名哥窯」（一七七五〈詠哥窯盤子〉）。以及「章生一所製器，紋百圾碎，謂之哥窯。弟生二所製為龍泉窯。」（一七九〇〈題哥窯盤子二首〉）。即使現在再加入《七修類稿》和《浙江通志》兩部書，通過相似的記載，完全無法規避哥窯燒於龍泉縣的說法。但是，一旦參考明人《遵生八牋》，則又不得不面對燒於杭州的另一種看法（一七八五〈詠哥窯

爐〉）。事實上，浙江省龍泉縣的大窯、溪口等處窯址曾發現黑胎青瓷，該類產品一直有龍泉仿官之稱。（註十）近來，沈岳明又依據龍泉窯中和郊壇下窯相似的器型，以及兩窯窯爐結構的相似度，提出南宋官窯中存在龍泉因素的嶄新論點。展出的兩件青瓷葵口碗（圖二六、二七）和另外兩件青瓷蓮瓣碗（圖二八、二九），適足以呈現南宋官窯和龍泉窯分享相似器形的議題。

相對於現代學者，乾隆皇帝眼界下的哥窯究竟是甚麼，以他降旨刻詩的青瓷盤為例（圖三十〈題哥窯盤子二首〉），可發現被他視為是哥窯的瓷器，明顯地具有百圾碎紋的特徵，表現出乾隆皇帝依據文獻識別的判讀方式。同樣觀察他降旨鐫刻器形與前述作品近乎一樣的瓷盤，底部卻刻出歌詠官窯的御製詩（圖三一），說明他無法清楚地分辨出官、哥兩個窯口。官哥不分鑑賞觀蘊藏的問題，透過老虎洞元代層窯址出土書寫「官窯」兩字銘的碗底殘件（圖三二），而可一窺可能的因素。

飾的作風，亦一路傳遞至宋元之交，甚至於元朝。因此，元朝青瓷碎器追仿南宋官窯器背後的緣由，或可看成

是一份跨越時代的青瓷風尚，以及蘊含其中對於官窯軌跡的追尋。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石光明、伍躍、董光和選輯，《乾隆御製文物鑑賞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清高宗撰，《清高宗御製詩文集》（景印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六。郭葆昌，《清高宗御製詩詠瓷詩錄》（一九二九年鉛印本），收入桑行之等編著，《說陶》，上海：新華書局，一九九三。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址二〇〇〇年發掘簡報》，《文物》，二〇〇一年十一月，頁四一—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者，《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八。
3.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國際交流特別展「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二〇〇九。
4. 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故宮學術季刊》二七卷四期，二〇一〇年夏季，頁一—三〇。高麗青瓷和汝瓷的比較見李喜寬，《高麗睿宗與北宋徽宗—十二世紀初期的高麗青瓷與汝窯、北宋官窯》，《故宮學術季刊》三一卷一期，二〇一二年秋季，頁六五—一六。
5. 唐俊杰，《修內司官窯之謎》，《幻之名窯—南宋修內司官窯杭州老虎洞窯址發掘成果展》，大阪：財團法人大阪市博物館協會，二〇一〇，頁一八一—二七。蔡和璧，《宋官窯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九。
6.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址》，《文物》二〇一二年十月，頁四一—三。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一〇。
7. 唐俊杰，《關於修內司的幾個問題》，《文物》二〇〇八年二期，頁六一—六八。崔劍峰等，《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修內司窯」銘薄胎的化學成分分析》，《文物》二〇〇九年二期，頁八七—九一。
8. 森達也，《汝窯與南宋官窯—燒造技術和器型的比較》，收入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五華誕宋代官窯及官窯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二〇一二年，頁一六三—一九四。
9. 相關說法與解釋見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五七，頁八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宋皇陵》，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頁四四八—四四九。及謝明良，《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青瓷及相關問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二〇〇五，頁三〇〇—三〇一。
10. 朱伯謙、王士倫，《浙江省龍泉青瓷窯址調查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一九六三年一期，頁二七—三九。湯蘇嬰，《龍泉瓦窯黑胎類產品及相關問題》，《考古》一九九三年一期，頁一〇二—一〇三。